

历史剧变

社会主义的挫折及其教训

王仲田 高金海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当代社会主义丛书
DANG DAI SHE HUI ZHU YI DA SHI CONG SHU

鲁新登字 01 号

《当代社会主义大势》丛书
历史剧变
——社会主义的挫折及其教训

王仲田 高金海 编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4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09—01462—4

D·382 定价：7.65 元

（限国内发行）

前 言

1989年到1991年,在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版图上,发生了一场举世罕见的强烈“政治大地震”。20世纪上半叶曾经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伟大成就,在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政治狂潮袭来之后,顷刻之间,“哗啦啦似大厦倾”,执政党纷纷垮台,国家迅速变质。许多原共产党人被逮捕、审讯、软禁,甚至遭受迫害,成千上万劳动者开始失业,流落街头。这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空前劫难,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

面对这场历史剧变,多少人陷入痛苦,多少人开始深思。然而,痛苦深思之余,人们禁不住要问: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演变,这场演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给人们提出了哪些值得深思的历史课题,执政的共产党人和社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回答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也许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每个共产党人和社会社会主义的实践者,都有责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历史也终将给人们以无情的回答。

一、苏联、东欧各国的政局演变是怎样发生的?其过程、结果和性质是什么?

苏联、东欧各国政局演变的过程,就多数国家而言,大体都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执政党在国内危机和国际势力的压力下,放弃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接受民主社会主

义,宣布实施“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存在;二是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召开由反对派参加的“圆桌会议”,反对派步步紧逼,执政党不断妥协退让,反对派乘机发展壮大;三是反对派向执政的共产党夺取,通过大选或不间断地制造动乱,甚至采取武力手段,把共产党赶下台。

苏东各国的演变过程,除了都有共同的“三部曲”外,就政权的转移、更迭方式而言,还有不同的类型的特点,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发生分裂,自己搞垮了自己,从而丧失了政权。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演变基本属于这种类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匈牙利。匈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波日高伊、霍恩等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领导核心内部发生分裂。在实行多党制、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和为1956年事件平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高层领导发生严重分歧,最后以波日高伊、霍恩为代表的激进派占了上风。1989年10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发生了组织分裂,使一个原有72万党员的执政党分裂为两个各自只有五、六万人的小党,这样力量大为削弱,为反对派通过大选接管政权铺平了道路。

第二种类型: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步步退让,最后被反对派逼下了台。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基本属于这种类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在咄咄逼人的反对派面前,也曾试图抵挡。然而,当反对派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利用煽动群众搞动乱,不断向党发起进攻时,执政党大都采取了以妥协退让求“团结”的做法,于是反对派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最后执政党被迫交出政权。其中的保加利亚共产党虽然在改名为社会党后在第一次大选中击败了反对派,但执政不到100天,又被反对派逼下了台。

第三种类型：通过武装冲突，发生政权更迭。罗马尼亚属于这种情况。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期，独断专行，经济情况恶化，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在东欧其他国家政局剧变的冲击和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齐示威，最后军队倒戈，并在战乱中处死了齐奥塞斯库，夺取了政权。

第四种类型：迫于各种压力，执政党自行解散，国家分裂，政权丧失。苏联政局演变属于这种情况。苏共原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之一，曾经取得过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以及卫国战争的辉煌胜利。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新思维”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逐步放弃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给党内带来极大的思想混乱，党的战斗力也大大削弱。1991年“8·19”事件发生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停止活动，他自己也宣布辞去党的总书记职位，同时统一的联盟也开始解体，于是执政党不战自败，国家政权也在分裂中丧失。

苏联东欧国家演变的结果是共同的，性质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共同的结果是：第一，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发生了变化。多数共产党已更名或改组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各党都主动地或被迫地放弃了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改变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抛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最后都逐步沦为在野党。第二，国家政权性质发生了变化。各国均取消了国名中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字样，标榜他们所要建立的是所谓“人道的、民主的法制国家”或干脆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新闻媒介多数掌握在右派手中，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军队、警察及公检法等部门实行了“非政治化”，彻底摆脱了共产党的领导；引进西方的议会两院制和多党制，多数国家的右翼党在大选中获胜并组成排斥共产党的政府。第三，明确提出并积极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波、匈、民德、捷、保、罗都制定了私有化方案，宣布要实行全面私

有化,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逐步趋于解体。第四,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这些国家大都把“返回欧洲”作为外交政策的中心,与原社会主义国家拉开距离,密切与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这些结果十分清楚地表明,苏东政局演变的性质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索,也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是完全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

二、苏联东欧政局演变的原因是什么?

苏东剧变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一般原因,又有根本原因。正是这多种原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才最后酿成一场震惊世界的悲剧。

苏东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内部原因是决定性因素。这些内部原因主要是:从客观上看,社会矛盾激化,各种危机加深、人民群众不满情绪增长和反对派力量兴风作浪,是直接社会根源;从主观上说,执政党领导不力、决策失误,党的建设削弱,党组织丧失战斗力和失去民心,是直接的决定性因素。

苏东事件的外部原因也不可忽视,主要表现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对剧变发生起了重要的促进和催化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政策,对东欧各国演变起了极大的纵容、诱发、引导、鼓励和支持作用;东欧各国的相互影响,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苏东剧变还有更根本性的原因,这就是各种体制的弊端。这种体制性原因主要有:干部人事制度缺乏竞争机制,不利于选贤任能和择优汰劣;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集中过度 and 民主不足,不利于科学决策,难以避免失误;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控制过严,不利于人们解放思想,探求真理;经济体制不合理,使生产劳动者与生产经营自主权、创造权以及劳动经营所获物质利益隔离,不

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民主法制不健全,既不能制约领导,也不能规范群众、动员群众,使勤政、廉政和政治开明、稳定失去保证。正是上述种种体制性弊端,导致党和国家领导素质与领导水平降低,决策不断出现失误,党风政风恶化,从而引起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以及党心和民心的丧失,激起广大群众的不满与愤慨,最后导致执政党垮台和国家变质。

三、苏联东欧剧变的主要教训是什么?

苏东剧变,来势之猛、规模之巨、影响之大,为全世界震惊。从剧变发生的复杂原因看,它给人们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这些教训的主要之点可以概括为:(1)执政党的素质及其建设至关重要。没有高水平的政党就没有高水平的领导,党的素质及其建设决定党的生命,决定国家的前途。(2)社会主义的根本优越性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不搞好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就没有生命力和吸引力,最后只能被它的主人——广大劳动群众所抛弃。(3)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创造,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智慧源泉和永恒动力,没有广泛的民主和广大群众的创造,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最后枯萎、腐烂,死亡、变质。(4)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发展动力,不改革、改革无成效,或改革偏离方向,都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

苏东剧变不仅留给人们许多教训,还给人们以很多启示,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历史课题,值得人们深思和研究,诸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特点问题,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素质特点、组织制度和领导方式及其建设完善问题,党与人民、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及民主法制的地位和建设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派产生的规律及其应

对政策问题,改革的规律及其领导艺术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问题,已经沦为在野党的原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利用合法手段重新夺回政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义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尖锐问题,也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的大问题,因而,也是一切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无法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

苏东剧变虽然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一次巨大挫折,也使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但只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亿万被压迫的劳动群众,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勇敢面对和正确回答现实问题,实事求是,团结奋斗,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重放光彩。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的反复较量	(1)
一、危机再起与团结工会的复兴	(1)
二、圆桌会议——大妥协的开始	(6)
三、议会大选——决定命运的政治较量	(9)
四、波党组阁受挫,团结工会登台执政	(13)
五、新政府的变革与统一工人党的解体	(16)
第二章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分裂的恶果	(21)
一、改革陷入困境,党内出现分歧	(21)
二、党内分歧加剧与多党制的确立	(26)
三、党内斗争激化与党组织走向分裂	(31)
四、反对派掌权,国家变质	(37)
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事件埋下剧变祸根	(42)
一、“布拉格之春”和改革新浪潮	(42)
二、反对派利用“1968年事件”制造动乱	(48)
三、捷共改弦更张和为“1968年事件”平反	(53)
四、反对党上台执政	(58)
第四章 民主德国:倒向西方的统一	(62)
一、公民出国潮导致政局骤变	(62)
二、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变路线	(67)
三、两种统一方案的较量	(74)
四、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	(77)
第五章 保加利亚:共产党从退让到蜕变	(82)

一、社会动荡的开始	(82)
二、日夫科夫辞职和反对派兴起	(86)
三、共产党蜕变为社会党	(92)
四、竞选中的较量和反对派夺取政权	(96)
第六章 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在军队倒戈中覆灭	(101)
一、剧变前的社会危机	(101)
二、风云突变,政权覆灭	(106)
三、救国阵线执政,国家改变方向	(113)
第七章 南斯拉夫:从共盟解体到内战	(119)
一、南共联盟的解体与丧失执政地位	(119)
二、民族矛盾的加深	(124)
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	(129)
四、内战烽火四起	(133)
第八章 阿尔巴尼亚:从极左到极右的转变	(140)
一、从反对改革到缓慢改革	(140)
二、政治多元化的确立与反对派的兴起	(145)
三、大选中的较量与劳动党的变化	(148)
第九章 苏联:从超级大国到四分五裂的剧变	(154)
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质	(154)
二、苏共丧失领导地位和反对党崛起	(163)
三、“8·19事件”始末	(169)
四、苏共解散和联盟崩溃	(176)
第十章 苏联东欧剧变的恶果	(183)
一、政治动荡	(183)
二、经济衰退	(192)
三、右翼反动邦派得势	(198)
第十一章 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	(205)
一、内部原因	(205)
二、外部原因	(219)

三、根本原因	(223)
第十二章 深刻的教训.....	(229)
一、没有高水准的政党就没有高水平的领导	(229)
二、不搞好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就没有生命力	(234)
三、没有民主和广大群众的创造,就没有社会主义	(238)
四、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不改革和改革无效都将 导致失败	(242)
结束语.....	(247)
附录:	
一、苏联东欧演变大事记	(251)
二、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统计	(314)
编后记.....	(321)

第一章 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 工会的反复较量

波兰剧变是整个苏东剧变的序幕，自然，它首先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波兰剧变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它与苏东其他国家的剧变有所不同，这就是剧变的轴心表现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的反复较量，剧变的大裂口开始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团结工会的妥协退让，波党的失利在于，政治上掉以轻心，对团结工会为首的政治反对派的力量估计过低，在合法斗争中，策略、方法掌握和运用不当。这些特点是我们研究波兰剧变应该掌握的基本线索。

一、危机再起与团结工会的复兴

（一）波兰战后的多次危机与团结工会的产生

1944年7月22日，波兰人民政权建立。建国40多年来，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过重大失误，经历过多次危机。正是在这些失误和危机中，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膨胀，并不断积聚，从而萌发和催生了政治上的反对派，为人民共和国的剧变和最终覆灭，埋下了隐患。

波兰战后的第一次危机，是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波兹南是位于波兰西部的一个重要工业城市，经济文化比较发达。1956年6月28日晨，波兹南采盖尔斯基工厂的1万多名职工，因领导没有调整不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发放加班工资而举行抗议游行

示威。游行过程中参加者不断增加,后来发展到近 10 万人。同时一些敌对分子也乘机混入游行队伍,尽力把水搅混,企图推翻人民政权。后来,游行占领了当地的一所监狱,夺走了储存的武器,释放了数百名犯人,同时又冲击省法院、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局,结果双方交火,发生了流血事件。最后,政府派军队恢复秩序,6 月 29 日事态平息。在这一事件中,死亡 70 多人,受伤者 500 多人,被捕者 600 多人。这次危机动摇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信任,震动了全国,在全世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波兰战后的第二次危机,发生于 1970 年 12 月。1970 年 12 月 12 日,波兰部长会议决定提高 45 种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提价幅度是 3.6% 到 92.1%。这一决定公布后,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首先停了工,不久,格但斯克市数千名游行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性示威游行。12 月 15 日,罢工浪潮由格但斯克市扩展到附近的格丁尼亚和索波特,罢工规模越来越大,卷入的人数急剧增加,而且发生了流血伤亡事件。12 月 16 日,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造船厂的工人举行了“占领性罢工”。与此同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莱·瓦文萨在这次罢工中崭露头角,并被选为格但斯克造船厂罢工委员会主席。12 月 17 日,事态进一步发展,在全国许多工厂都发生了罢工和街头闹事事件,并与政府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12 月 19 日,格但斯克的罢工结束。但布什青和罗兹两城市的罢工一直持续到 1971 年 1 月 25 日。这次危机,结局惨重,死亡 45 人,伤 1165 人,被拘捕者 2989 人。

这次危机虽然暂时平息了,但造成危机的社会矛盾并未消除,而且日益复杂,最后造成政治反对派的崛起。1976 年 6 月,波兰政府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再次宣布提高肉类和食品价格,决定肉价平均上涨 69%,黄油上涨 50%,食糖上涨 100%。消息传出后,腊多姆·乌尔苏斯和普沃茨克等地又发生了抗议

罢工,并且发生了人员伤亡事件,许多工人在罢工中被捕。这次工潮平息后不久,1976年9月,产生了波兰战后第一个反对派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其宗旨是为那些因参加游行示威而遭受迫害的工人募捐,它的核心人物是多年来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知识分子雅采克·库龙等人。1978年,在格但斯克等沿海城市、西里西亚、乌尔苏斯等工业中心又出现了自由工会组织。其中格但斯克自由工会的领导人就是1970年12月危机中崭露头角的莱赫·瓦文萨等人。这些反对派组织及其领导人,实际就是后来改变波兰命运的反对派——团结工会的组织基础。然而,这些政治现象并未引起当局的重视。

1980年,波兰爆发了战后的第三次大危机,同时在危机中产生了最后推翻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1980年7月1日,波兰政府决定提高“议价商店”的肉类销售价格40—60%。当天,东南部一小城市米耶莱茨一家交通设备厂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抗议肉价上涨。次日,华沙郊区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华沙钢厂和罗兹的一些工厂也发生罢工。7月16日,卢布林市的工厂、企业和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封锁了当地的铁路线,使铁路交通中断4天。8月10日华沙清洁工人举行了6天罢工。为了平息工潮,政府同意给30多家企业的工人提高工资10%,以抵销肉价上涨。然而罢工浪潮并未平息,相反愈演愈烈。从1980年8月14日起,罢工由分散、自发转向联合和有组织地进行,罢工者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罢工中心转到了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8月14日,波兰最大的造船厂——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1.6万名工人举行罢工,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推选莱赫·瓦文萨为罢工委员会主席。8月16日,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三联城”21个工厂工人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推选瓦文萨为主席。8月19日,什切青的罢工工人也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马里安·

尤尔奇克被推选为主席，政治反对派——保卫工人委员会领导人库龙等人被聘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顾问。8月20日，警察局逮捕了库龙、米赫尼克等政治反对派领导14人。随着罢工浪潮的扩展，“三联社”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了21项要求，希望同政府谈判。这些要求主要是：政府同意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释放政治犯，停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提高职工的基本工资；实行言论自由；让社会各界、各阶层参加改革方案的讨论等。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政府不得不开始谈判。从8月30日到9月3日，经过谈判，政府分别与以马里安·尤尔奇为首的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以莱赫·瓦文萨为首的三联社厂际罢工委员会等罢工组织签署了协定书。这些协定书基本满足了罢工者的政治经济要求，即政府同意建立独立于党和政府的自治工会、已成立的罢工委员会转变为工人委员会、释放政治犯、提高工资等要求。与此同时，持续了18天的“八月事件”暂告结束。此后不久，9月24日，根据政府同罢工委员会签署的协议，即同意成立独立于党和政府的自治工会，工人委员会（原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向华沙省法院提出成立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简称团结工会）的登记申请，其总部设在格但斯克。11月10日，波兰最高法院批准团结工会登记，从而标志着政治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作为合法组织正式诞生。

（二）团结工会受挫与新的危机中东山再起

团结工会成为合法组织后，会员人数很快发展到数百万，最多时达到1000多万，其中100万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占该党党员总数的1/3。波党和政府领导人，原以为团结工会合法化后，可以实现国内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然而，团结工会中的极端派和他们的专家、顾问们，不与波党和政府合作，故意挑拨工人同党和政府的关系，重新挑起罢工事件。从1981年初开始，各地陆续发生罢工，要求实行星期六休息制度。

1981年9月5日,在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瓦文萨宣称团结工会要创建理想的波兰。大会通过的工会纲领,攻击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由团结工会接管政权。12月13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在腊多姆召开秘密会议,决定通过总罢工和建立武装工人卫队,夺取全国政权。不久团结工会领导又召开会议,决定在12月17日,即1970年“十二月事件”10周年之际,在华沙和格但斯克同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然后夺取政权。面对如此紧迫的政治局势,为了挫败反对派的阴谋,保卫波兰人民政权,波兰政府宣布,从12月13日起,全波兰进入战时状态。与此同时拘捕了包括瓦文萨在内的团结工会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领导人,全国大约有近5000人被拘捕。团结工会的组织被取缔,活动被禁止,公开的斗争被迫转变为地下的秘密活动。全国暂时恢复了秩序。

1983年7月21日,波兰国务委员会宣布,鉴于战时状态的目标已经达到,从7月22日起,波兰全国取消军管,从7月23日起实行大赦。通过几次大赦,团结工会的领导和一大批活动分子又公开活动,继续与党和政府进行斗争。

80年代后期,波兰经济陷入困境,社会危机不断爆发。1987年通货膨胀率为26%,1988年上升到67.5%。1982年外债为248亿美元,1988年高达395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国民收入的40%。农业生产连续两年滑坡,市场食品短缺极为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此情况下,政府又决定大幅度提高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于是遭到工人群众的普遍反对。从1988年4月到9月,又相继爆发了1982年以来最严重的大罢工。在罢工浪潮中,团结工会东山再起,在西方一些国家支持下,积极进行活动,利用不断扩大的工潮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恢复其合法地位。原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表示,除非罢工者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罢工将进行到底。在团结工会的控制和影响下,罢工浪潮不断

扩大,波兰局势日益紧张。在此情况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表示,同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同社会各方面(包括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讨论波兰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与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等举行会谈,就召开圆桌会议的前提和组织方式等问题进行协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逐步达成一致意见或取得谅解。由于政府改变了对团结工会的态度,开始了对话、协商,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罢工浪潮逐步平息。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的较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圆桌会议——大妥协的开始

(一)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实行政策大调整

为了缓和国内局势,波党和政府同意召开圆桌会议,与政治反对派团结工会等组织进行对话。这与军管时期的政治对抗相比,无疑是对政治反对派的让步。尽管如此,但由于在召开圆桌会议的前提条件等方面,双方有重大分歧,故圆桌会议迟迟不能召开。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坚持以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为召开圆桌会议的先决条件,而政府则认为,不能让团结工会合法化。为了给政府施加压力,瓦文萨等人于1988年12月18日采取了一个重大举动:由128名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原团结工会领导人成立了一个被认为是“影子政府”的“公民委员会”,要求实行多元化,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波兰社会改革发展与克服危机的主张,与政府进行对抗,也向即将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提出了挑战。

为了解决时局提出的紧迫问题,尽快消除社会危机,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十届十中全会。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988年12月20日到12月24日,第二阶段从1989年1月17日到1月20日。会议就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地位和实行政